

中印边境之争，长期以来横亘在亚洲两个大国之间最大的鸿沟，一直难以愈合的伤口

中印边境冲突

内幕纪实

- ★ 印度五次核试验，使中印关系骤然紧张。
- ★ 印度大国梦，南亚震荡不安的根源！

刘少奇与毛泽东

——半个世纪的握手

张之洞

唐浩明继他的成名作《曾国藩》、《杨度》之后，推出的第三部力作。本刊独家专稿

陈独秀与四位女人的传奇婚恋

湖南文史

一九九八年 第四期 双月刊 总第八十二期



ISSN 1004-8170



07>

9 771004 817000

EA37/22

HUNANWENSHI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8年第4期
(总第82期)

国内外公开发刊

主办: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辑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邮编:410011
电话:4405622 4405519
印刷:湖南省卫生厅机关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8170
定价:4.98元

本刊特稿

半个世纪的握手 ——刘少奇与毛泽东(一)

.....欧阳雪梅(4)

往事追怀

我的世界冠军之梦

.....郎平(19)

名人轶事

王震与张平化的生死之交

.....尹纬斌(23)

鲁迅与郭沫若的笔墨情

.....张宗高(27)

杨勇诚服宋希濂

.....于长治(30)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广字C-0057号

陈独秀与四位女人的传奇婚恋

.....山 夫(33)

政坛秘闻

中印边境冲突内幕纪实

.....海 童(38)

文史掌故

蒋介石八次来湘揭秘(下)

.....史 明(44)

三湘名将

一位抗日名将的悲剧人生

.....刘美炎(50)

传记长廊

张之洞

——长篇历史小说连载之一

.....唐浩明(57)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目录

《湖南文史》编委会

顾问:龙禹贤 袁隆平

杨汇泉 陈彰嘉

主任:田伏隆

副主任:陈满之 龚固忠

龚汝仁 郑怡庭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柏青 向哲慎 李 静

李振川 肖华锋 吴志宪

邹启炎 宋春祥 陈本洪

陈励青 武俊瑶 柳修松

曹曾祝 廖长发

社 长:田伏隆(兼)

主 编:易亮如(代)

副社长:李武扬(代)

副 主 编:彭德才

总编室主任:江 涌

美术编辑:肖琼琼

责任校对:杨 曦

半个世纪的握手 ——刘少奇与毛泽东

也许是历史的偶合,也许是历史对湖南的眷顾,在20世纪,在仅一岭之隔的两个穷山冲里奇迹般地同时产生了两位伟人:韶山冲的毛泽东和炭子冲的刘少奇。

两位伟人的性格迥异,但不影响他们携起手来,在中华大地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刘少奇与毛泽东交往的历程,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进程,只有了解了刘、毛二人的关系,才能真正全面的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本文以真实可信的史料,生动细腻的手法,再现了两位伟人半个世纪的握手之情。

中印边境冲突内幕纪实

1998年5月11日,印度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48小时内连续进行了2轮5次地下核实验。

中印边境问题是长期以来横亘在亚洲两个大国之间最大的鸿沟,印炭的核爆炸,使处于微妙之间的中印关系变得骤然紧张,人们不禁想起了1962年那场中印边境战争……

张之洞

从一个书生到权倾朝野的重臣,从清王朝统治集团清流派的中流砥柱,到继中兴名臣李鸿章之后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首领。他讥评时政,弹劾贪官,兴学育才,兴办实业,厉行练要,力主抵抗外国侵略,一生刻满传奇。湘籍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继他的成名作《曾国藩》、《杨度》之后推出他的又一力作《张之洞》,本刊将从这期开始以连载方式独家刊出。

陈独秀与四位女人的传奇婚恋

说起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就不能不谈陈独秀。他对新建礼教的无情鞭挞和对新思想的执著,演绎为对自由恋爱婚姻的狂热追求。其间,有多少浪漫、温馨,有多少苦涩、无奈……

EA37/22

HUNANWENSHI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8年第4期
(总第82期)

国内外公开发刊

主办: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辑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邮编:410011
电话:4405622 4405519
印刷:湖南省卫生厅机关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8170
定价:4.98元

本刊特稿

半个世纪的握手 ——刘少奇与毛泽东(一)

.....欧阳雪梅(4)

往事追怀

我的世界冠军之梦

.....郎平(19)

名人轶事

王震与张平化的生死之交

.....尹纬斌(23)

鲁迅与郭沫若的笔墨情

.....张宗高(27)

杨勇诚服宋希濂

.....于长治(30)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广字C-0057号

陈独秀与四位女人的传奇婚恋

.....山 夫(33)

政坛秘闻

中印边境冲突内幕纪实

.....海 童(38)

文史掌故

蒋介石八次来湘揭秘(下)

.....史 明(44)

三湘名将

一位抗日名将的悲剧人生

.....刘美炎(50)

传记长廊

张之洞

——长篇历史小说连载之一

.....唐浩明(57)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目录

《湖南文史》编委会

顾问:龙禹贤 袁隆平

杨汇泉 陈彰嘉

主任:田伏隆

副主任:陈满之 龚固忠

龚汝仁 郑怡庭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柏青 向哲慎 李 静

李振川 肖华锋 吴志宪

邹启炎 宋春祥 陈本洪

陈励青 武俊瑶 柳修松

曹曾祝 廖长发

社 长:田伏隆(兼)

主 编:易亮如(代)

副社长:李武扬(代)

副 主 编:彭德才

总编室主任:江 涌

美术编辑:肖琼琼

责任校对:杨 曦

半个世纪的握手

刘少奇与毛泽东

(一)

● 欧阳雪梅

在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中共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和刘少奇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两位。

也许是历史的偶合,也许是历史对湖南的眷顾,自王夫之以来,湘楚大地涌现了无数救国救民的忠烈伟人。以至于人们要说 20 世纪是湖南人的世纪,而这句活的最大体现就在仅一岭之隔的两个穷山冲里奇迹般地同时产生了两个伟人。韶山冲与炭子冲的毛泽东与刘少奇潇洒地书写着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

同样是穷山冲,却孕育了两个伟人迥异的性格:毛泽东风趣幽默,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富于激情,是位戏剧型性格的领袖;刘少奇性情温和,不轻易流露感情,工作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在党内素以“实干、严谨”著称。然而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却携起手来,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政治队伍,在中华大地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改变了中国面貌,为中国革命史添上了一幅壮丽的画卷。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们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具有广阔的视野,领袖人物超凡的号召能力以及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刘少奇具有做组织工作的那种把握具体工作的耐心和技巧,没有这些,毛泽东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无法取得成功。毛、刘合作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刘少奇一生的命运与毛泽东息息相关。

毛泽东派刘少奇去安源领导万余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刘少奇事业的起点。由此,刘崭露头角,成为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

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方面军。毛泽东是苏区方面军的代表,而白区方面军的代表,毛泽东认为是刘少奇。

毛泽东非常重视刘少奇的才干,从 1943 年初开始,进入延安的刘少奇实际上就成为了毛泽东之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

1949 年 10 月 1 日,刘少奇与毛泽东并肩而立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刘为这位湖南老乡祝福、庆贺,为新解放的亿万苍生而祝福、庆贺。

50 年代末,毛泽东把一线工作交给了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此时,中国有两个主席:一个姓毛,一个姓刘。

1961 年,毛泽东通过蒙哥马利元帅向世界宣布: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当时盛传的一句话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主席。刘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当迥异的性格一旦出现不和谐的时候,曾经一切的辉煌却再一次放大为差异,从 1962 年开始,毛、刘出现了分歧。后来发展到毛认为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决心发动一场革命将刘从政治上铲除。

在野心家的推波助澜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演变成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毛变成了尊神，刘则变成了冤鬼，堂堂的共和国主席最后连肉体都被消灭了。

刘少奇在与妻子离别之前，留下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中透着自信，也充满着苦涩、无奈，表明此时他已对神坛上的毛泽东失去了信心。

7年后，毛泽东也“收到了上帝的请帖”，带着对文革的几分反思，郁郁而终。

刘、毛二人交往的历程，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进程。了解刘、毛二人的关系，才能真正全面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时了解党的杰出领袖是历史的巨人，但不是圣人。

在长沙清水塘，刘少奇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从此，两位革命者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奋斗。

湖南省长沙市小吴门外，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菜园和草地。菜地旁边，是一口面积不大但水质清爽的池塘，几株轻轻摇摆的垂柳伫立在塘边，显得宁静而又幽雅。这便是清水塘。在池塘的一侧，有一座普通的青砖小平房，这就是清水塘22号。中共在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5月成立后，执委会机关就设在这里，区委书记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因为这是城郊的一个冷静、荒僻、无人注意的地方，利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22年8月中旬的一天，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顶着似火的骄阳，风尘仆仆地来到清水塘找毛泽东。

这个年轻人就是刚刚从上海来长沙的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刘少奇是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7岁就参加过讨袁斗争。为寻找强国富民之路，先是报考长沙的陆军讲武堂，希望能习武救国。学业刚开始，护法战争爆发，南北两军在长沙激战，陆军讲武堂校舍成为一片废墟，手无寸铁的几百名学员四散各方，学校被迫解散，刘少奇的习武救国梦想破灭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奇受革命思潮的吸引，来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刘少奇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想留在北京上大学。他接连报考了几所大学，都以优秀成绩被录取。但是，这些大学尤其是他最想上的北京大学，学制长，学费昂贵，根本不是乡村农户能支付得起

的。因此,在北京上大学的计划不得不放弃。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刘少奇得到一个消息:北京华法教育会正组织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在当时是许多有识之士鼓吹的一条救国之路。刘少奇跟踪找人,得到的结果是:旅费自理。囊中羞涩的刘少奇只好到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等候时机去法国。

在保定,育德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它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河北的秘密集会场所;许多师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毛泽东曾来过这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校里革命气氛浓郁,《新青年》、《东方》等进步刊物在这里公开陈列,广为流传。在这里,刘少奇听说了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等等,只不过他还了解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实现它的途径、方法。

刘少奇在育德中学学习了一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去法国勤工俭学未能成行。这时,已是1920年8月了。刘少奇离乡背井外出寻找出路已是4个年头了,从长沙到北京到保定,现在又从北京回到长沙,何处是征途?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及“赴俄勤工俭学会”。这个消息使刘少奇兴奋异常,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于是他决定改赴法为赴俄。

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何叔衡等湖南的革命人士在1920年8月发起组织的。稍后,他们又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筹建中,他们得到了长沙著名进步人士、船山学校民范(又名贺希明)的帮助。因此,上述两个组织都借用他的声望公开出面号召。许多湖南青年也都通过他同这两个组织发生联系。刘少奇去船山学校找贺民范,如愿以偿地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拿到了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的介绍信。多年的寻觅,多年的奔波,这下总算有了结果。

1921年春,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了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刘少奇,在学社负责人杨明斋的帮助下,和任弼时、肖劲光等10余人踏上了去莫斯科“红都”学习的旅途。艰辛颠簸了3个月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尤其令人激动的是刘少奇等到达莫斯科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他们就作为编外人员旁听,幸运地见到了大会名誉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及其他一些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聆听他们作报告。会后,刘少奇等人被分配到新建立的为

远东国家培养革命骨干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成为这所著名大学的首批学生。

就在东方大学即将开学之际,远在中国东部的上海、嘉兴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湖南赴会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但这时共产党在国内是秘密组织,加上通讯困难,刘少奇等人对此一无所知。

到了1921年冬天,中国共产党为发展自己的组织,在东方大学中发展成员。刘少奇、罗亦龙、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都已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便首先由团员转为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

加入共产党,是刘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转变和崭新起点。为了追求光明,他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摸索过程,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人生目标。从此,他始终坚持指导他一生的党性原则,终其一生,作一个好共产党员。

后来,刘少奇对他的孩子们缅怀往事时说:“我加入党的原因是我认识到我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个人问题,只有通过解决国家的民族的和整个社会的问题,个人的问题也才能得到解决。整体利益提高后,个人利益才可以提高。”

1922年春,在东方大学学习了7个月的刘少奇根据组织决定奉调回国,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少奇参与了“二大”的一些会务工作。在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因湖南劳工会领袖被军阀赵恒惕杀害,来上海开展反赵运动,同时准备参加这次大会,“但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同志们,结果错过了”。会后,陈独秀接见了毛泽东,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把中共“二大”刚刚通过的文件交他带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于是便有了前面刘少奇来清水塘的一幕。

就在清水塘22号这座小房子里,毛泽东、刘少奇会面了。虽然他们的诞生地仅一岭之隔,刘少奇是通过毛泽东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去上海,然后赴“红都”留学,但彼此互不相识。今天,他们在各自经过了一段艰辛坎坷的探索历程之后,不约而同走到共产主义旗帜下,两人不免感慨万千,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从此,两位革命者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奋斗,为中国革命史添上了一幅壮丽的画卷。此后,刘少奇的命运就与毛泽东息息相关。

会见中,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共“二大”的召

开情况,转交了临行前陈独秀交付的文件。毛也介绍了湖南的形势和组织情况,两人还自我介绍了过去的经历,言来语去,十分融洽。

初次会面以后,刘少奇又多次在清水塘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形势和工作。刘少奇因为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大会公开发言很少,同毛泽东个别交谈倒是很多,与毛泽东的了解日渐加深。

对在清水塘同毛泽东的相识相交,刘少奇怀有美好的回忆。30年后的1952年,他在全中国解放后第一次回湖南,还和夫人王光美专门去寻访他同毛泽东初次见面的清水塘。可是,由于年代变迁,当时竟没有找到。

毛泽东派刘少奇去安源领导万余路矿工人的大罢工,刘崭露头角,在工运领域里大显身手,把安源工会发展成全国工会中的一面红旗。由此,刘少奇成了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开始了他辉煌的人生。

1922年9月初,长沙的夜晚已不像白天那样,令人感到燥热。阵阵凉风吹拂而过,说不出的畅快。在清水塘畔的毛泽东家,灯在亮着。坐在灯下的毛泽东和刘少奇正在交谈:

“少奇,我前几天到安源去了,了解到那里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也感觉到那里缺少得力的党的干部。要领导1万多工人的大罢工,隆邦(注:李立三)他们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们商量,把你派到那里去,参加领导即将举行的大罢工。”毛泽东以征求意见的口吻,把工作任务告诉刘少奇。

“我?”

“是的,你有领导长沙土木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派你去,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好!我去。”刘少奇神情中现出激昂斗志。接着又说:“都说安源是个‘小上海’,还真想去那里看看哩!”

“既然决定去,那么,我先给你讲讲那里的情况好吗?再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干。”

屋外一片宁静。屋里的灯,一直亮到东方发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提出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机构。毛泽东是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在湖南,毛“猛烈地推行工会的工作”,将党的重要干部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与手工业中去开辟这块处女地。刘少奇一回湖南,就出席了长沙土木工会成立大会,参加领导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的罢工。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拥有矿工12000多人,铁路工人1000多人,是当时南部中国最大的产业之一。安源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1921年冬,毛泽东穿着一身旧蓝布衣服,背着一把雨伞,徒步去安源,深入矿井和工人“餐宿处”了解情况,随即还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1922年五一节,安源正式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初,安源工人在粤汉铁路、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影响下,为争取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和路矿当局形成对峙。一场大工潮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善于捕捉战机的毛泽东当然不会坐失良机,他马上调兵遣将,一面通知正在醴陵探亲的李立三迅速返回安源,一面果断地将刘少奇从粤汉铁路罢工前线调往安源,以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

1922年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同李立三三会合。他俩顾不上寒暄,就和俱乐部的负责人蒋先云、朱少连等一起投入罢工的准备工作中。当时,李立三同志受到敌人威胁,为防不测,让他担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担任俱乐部的全权代表,负责前台指挥,以及与各方面的联系、谈判。

正在紧张忙碌之际,刘少奇、李立三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指出罢工要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这无疑及时雨,他们决定在罢工中实行。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还笼罩在黑沉沉的夜幕中,株萍铁路象一条巨大的蟒蛇,蜿蜒卧在安源山下。突然,“呜——呜——呜——”,安源车站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接着,矿区的电笛也高声长鸣。这响彻云霄的笛声,划破了黑暗的长空,向人们宣告: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工人们潮水般涌出矿井、车间,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斧头、岩尖,高呼着:“罢工了!罢工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

罢工开始后,除发电厂、鼓风机和抽水机“遵守”俱乐部命令照常工作外,其它一律停工。工厂关门,矿井封闭,列车停驶,工人们全部在宿舍待命,整个环境平静而有序。臂带袖章的纠察队员把守着要道路口和厂矿出入处。墙壁和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标语和布告。罢工宣言中那哀而动人的语言叩人心扉:“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干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工人大罢工实现后，路矿当局和官厅十分惊慌。他们一面火速向萍乡县知事和赣西镇守使告急，要求派兵进驻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罢工，一面要地方商会出面斡旋调停。

14、15日，调解人提出请工人先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遭到刘少奇拒绝。

16日，罢工进行的第三天，路矿当局派人送来一封封信，要求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刘少奇作为全权代表前往。

设在矿局办公楼内的戒严司令部，警卫森严。门口台阶两旁，架上了两挺机关枪。进门楼梯的两边，站着背盒子枪的卫兵。走廊上的士兵手握上了带刺刀的枪，一个营长持着手枪来回巡逻。

刘少奇拿着条件书向戒严司令部走去。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大家为他的安全担心，纷纷对他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他们会害你，这是人虎穴啊！”刘少奇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

穿过道道岗哨，刘少奇跨入戒严司令部，从容地在戒严司令和矿长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戒严司令李鸿程看见工人代表是个毛头小伙子，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便抬高嗓门蛮横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次。”

刘少奇断然道：“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希望。”

李鸿程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之所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研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问题！”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高喊：“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片瓦不留！”“要谈到俱乐部去谈！”

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见势不好，担心乱子闹大，忙恳求刘少奇出面维持一下秩序。

刘少奇走出谈判室，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

在还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人群马上安静了下来。

工人的强大力量和工人代表的宁死不屈，使军阀软下来，表示愿作调停人，从速解决罢工问题，请刘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研碎罢！”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戒严司令部。

17日，发电厂、抽水机和鼓风机都因燃料告罄而出现停机的危险。这几处一旦停机，所有的矿井都将报废。“屡战皆北”的路矿当局被迫答应以俱乐部所提的条件为基础，商谈复工条件。当晚，李立三、刘少奇等俱乐部代表，路矿两局代表，地方商绅代表三方会谈。谈判到凌晨2时，经过激烈争论和斗争，完成草约13条。第二天上午，正式签约。协议的内容包括俱乐部代表工人权利，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等。工人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在敌人重兵把守的矿区，领导万余工人的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完全胜利，这在早期工运历史上是一个少有的范例。

刘少奇罢工中表现出来的胆识，受到工人们的普遍称赞。有工人问刘少奇：“听说你有13块金牌护身，所以老板和军队不敢动你，是吗？”刘少奇笑着说：“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真理在我们一边，因此我不怕。我哪有什么13块金牌，半点也没得，1万多工人的团结，才是我力量的源泉。”

大罢工的胜利，使安源工人俱乐部声名远播，也使世人认识了崭露头角的刘少奇。1922年10月，俱乐部重新选举各级代表和负责人，李立三任总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因事离开安源，刘代理总主任。8月，刘正式当选为总主任。后来还担任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

“二·七惨案”后，反革命势力嚣张，在各地工人运动走入低谷的情况下，刘少奇正确执行毛泽东的灵活政策，审时度势，调整策略，在工会内部，主要是巩固组织，培养部员，提高工人智识和能力；对敌斗争，只举行游行示威，只提出要求不高的经济条件。所以，在工运低潮中，安源工会不但未受损失，相反还有一定发展。尽管环境恶劣，由于策略得当，措施得力，安源工会红旗不倒，成为“硕果仅存”、“全国工会中组织最好的工会”。

随着安源工人运动的步步胜利，刘少奇的名望日

隆,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1925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年龄不到27岁的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

刘少奇与何葆贞联姻,毛泽东是红娘。

刘少奇与何葆贞的结缘,是在清水塘毛泽东的家里。1922年秋,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葆贞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的家里。毛泽东为他们彼此作了介绍。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较好印象。

何葆贞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生活经历。她原名宝珍,大名葆珍,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持5口之家的生计。由于生活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小葆贞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伴读。葆贞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炼,养成了葆贞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1918年秋,葆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葆贞来长沙后,毛泽东介绍她到湖南自修大学学



青年时代的刘少奇

习,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给她取了“葆贞”这个名字,鼓励她永葆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何葆贞的所言所行的确无愧于这个名字。

何葆贞从自修大学毕业后,毛泽东就派她去刘少奇领导的安源俱乐部工作,作刘少奇的帮手。

到安源后,何葆贞在安源路矿工会办的工人子弟学校教书,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孩子的家长。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何葆贞更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工作非常热情、认真,没有教材,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成书;缺笔少纸,她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利用参观访问,化妆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那些从前“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的地位卑微的工人们,如今坐在俱乐部的教室里接受教育,听教师讲衣食住行的由来:“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一桩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作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这样,把知识的学习与革命思想的灌输结合起来,又与工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俗易懂,因此,给人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几十年后,听何葆贞讲过课的人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葆贞在俱乐部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安源工人都很尊敬、喜欢她。

工人俱乐部的工作紧张而充满激情,在共同的奋



何葆贞烈士

斗中,何葆贞和刘少奇相爱了。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艰难险阻的考验。

在安源共同生活了两年后,刘少奇离开了安源,去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此,何葆贞随刘少奇四处奔波,过着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光是上海,何葆贞就四进四出,一直夫唱妇随,做着辅助性的工作。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苏区,何葆贞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长。由于她的积极活动,引起敌人注意,于1933年3月被捕,后解往南京。

在狱中,何葆贞非常坚强,经常鼓励难友,机智地与狱吏作斗争。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何葆贞暴露了身份,于1934年深秋血洒雨花台。临刑前她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这一年,她刚32岁,是人生最绚丽的年华。

何葆贞去世后,刘少奇满怀深情地追念她,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特意去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她。有夫如此,何葆贞当含笑九泉。

1923年4月和1925年春,毛泽东和刘少奇先后走出湖南,跻身更大的中国革命舞台。

中共“一大”之后,青年毛泽东主张,要做到乾坤扭转,天翻地覆,工人必须组织起来斗争。1922年,他除了用“哀兵必胜”的策略指导刘少奇在安源的罢工斗争外,还身着工人装,带着口哨,站在长沙示威请愿工人行列中,领导长沙工人与当局斗争。

由于毛泽东点燃了湖南工人运动的火种,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罢工活剧,揭露了赵恒惕的假民主面目,让他们既惊且怒。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因此,他处心积虑地要对付毛泽东。

1923年4月上旬的一天夜里,一个在赵恒惕府中工作的同志,匆匆赶到清水塘通知毛泽东,赵恒惕派来抓他的兵就要来了。毛泽东迅速收拾好文件,作了紧急安排,从屋后穿过菜园小路走开了。赵没有捉到这个危险人物,于是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沉着镇定是毛一生的习惯。他从容地布置完湖南党的全盘工作,在“通缉令”下了半个月

之后,才离开湖南,绕道上海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议。

在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成为了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组织部长并任中央局秘书、主持中共日常工作。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器重这位才干出众的湖南青年,亲自提名他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在上海,毛泽东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时,兼顾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繁重的工作累垮了他的身体。1924年底,毛泽东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毛泽东曾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少,满山遍野是农民,应重视广大的农民。于是,他利用在韶山养病的时间,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但韶山农运的红火,使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引来了赵恒惕的又一次通缉。1925年8月下旬,毛“闻道入粤”。

在广州,毛泽东先是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1926年3月,以国民党宣传代部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身份出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所长,培养“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农运的火种由此洒向神州大地,沉寂的乡村从此沸腾了。

农民运动需要卓越的领袖。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期间,历经千里跋涉,完成了他的警世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走出湖南之后,以领袖的敏锐,寻找改造中国的真谛,勇敢地做了“农民运动的王”。

刘少奇离开湖南,则是在1925年春。

1924年底,中共领导机关决定调刘少奇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参与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

在第二次劳动大会上,不到27岁的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从此,他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地急需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前线阵地。由于他在工运中的成就,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成为了中央委员,和毛泽东一样开始走上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舞台。尽管离进入中共核心阶层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但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生活环境艰苦,工作超负荷是中国革命时期非常平常的事,一些领导人甚至累死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1925年秋,毛泽东刚养好病离开湖南,刘少奇又因操劳过度,肺病发作,病倒在上海的工作岗位上。

1925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一对青年夫妇来到长沙市城北贡院西街的一个小书店。正在书店值班的会

计热情地将他们迎进书店里屋,稍事寒暄,即安排他们在书店后楼住了下来。

这个书店叫长沙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1920年9月创办的,历来是湖南党组织的一个活动地点。书店经理因事不在长沙,书店业务暂由女会计许文煊负责。这天许会计接待的客人,便是刚从上海来长沙就医的刘少奇和夫人何葆贞。

文化书社附近有一所湘雅医院,就医方便,何葆贞则抽空去宁乡看望分别近一年的年幼的儿子刘允斌。

经过一个来月的治疗、休养,刘少奇的肺病逐渐好转。

不曾想到的是,正当刘少奇积极准备重返工作岗位时,几个便衣突然闯进文化书社,二话不说将刘少奇抓了就走,将他关在长沙戒严司令部。

这是赵恒惕干的事。他两次没有抓到毛泽东,这时抓住了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的刘少奇,如获至宝。

殊料,第二天长沙《大公报》报道了刘少奇被捕的消息,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抗议赵恒惕的电报雪花似地飞来。中共有关组织全力组织营救。刘少奇的夫人和哥哥更是到处奔走,千方百计地调动各种社会关系出力营救。他们通过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动员了包括赵手下的师长叶开鑫、贺耀组、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在内的要人出来说话、担保。

赵恒惕万万没有料到,抓了刘少奇,竟使自己陷入内外受责,四面挨骂的境地。为避免更大的麻烦,他便借叶开鑫等头面人物出来担保的由头,顺水推舟地同意释放刘少奇,条件是要求他5天内离开湖南。

1926年2月上旬,刘少奇终于获释。滑稽的是,赵恒惕在刘少奇临走时派人送赠了一册《四书》。大概是希望刘少奇读通《四书》,别作“乱党”,作个顺民。这个滑稽剧在湖南传播一时。

获释后的刘少奇先是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尚来不及休整,因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病重,急需他接替林伟民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又匆匆登上了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经过几天的航行,2月19日抵达广州。

刘少奇一到广州,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刘少奇的出狱和到达广州,特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邓中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经过刘少奇、邓中夏等人的紧张筹

备,第三次劳动大会于1926年5月1日如期举行。刘少奇是大会的主持人。在会上,他先后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和全总执委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这样几个鲜明的观点: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不彻底,工人阶级应与它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但应反对它的妥协倾向。

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同毛泽东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精神一致,观点吻合,可谓不约而同。

在大会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的领导人员中,刘少奇任全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委员长是海员出身的工人领袖苏兆征。

第三次劳动大会闭幕后,刘少奇、邓中夏等人于6月间主持创办了一所劳动学院,为的是“研究工人运动,养成工会人才”。与稍前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可说是同工异曲。邓中夏任劳动学院院长,刘少奇任教授,并负责讲授《工会组织法》。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打倒军阀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从广州挥师北上,开始了著名的北伐战争。毛泽东和刘少奇不久也随之移师北上,抵达武汉,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

大革命开始后,走出湖南的毛、刘,一个从事农运,一个从事工运,日后发展为一个占据乡村,一个坚守城市,遥相呼应,成为中国革命之两翼,共同书写改造中国的篇章。

国共决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战斗在虎穴的刘少奇,以其惊人的胆略,正确的策略而成为“白区”方面军的代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东南半壁尽入反动派手中。此后不久,武汉夏斗寅叛变,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对危急局势,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一筹莫展,他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陈独秀的主张,他大胆地提出

了“上山”的思想。他指导“马日事变”后的湖南同志：“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武器坚决与敌人斗争。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再次明确提出了他“上山”的主张，指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中旬，改组后的中央临时常委会终于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提出农民武装在无法公开存在时“可以上山”。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他那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会后，他谢绝了瞿秋白建议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提议，坚持要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星夜直奔长沙，去组织秋收暴动。

为组织好秋收暴动，毛泽东在湖南等地四处奔走。在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敌军之手。这是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倘若他不是凭机智逃出险境，中国现代史可能就需要重写了。

9月9日，在毛泽东、卢德铭的领导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终于爆发。

毛泽东决定放弃“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做法，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同时，他鼓励部下：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那口大水缸。

然后，毛泽东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永新县三湾村整顿队伍，确定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率领整编后剩下的700多精兵，进军井冈山。毛泽东经过收编袁文才、智服王佐，终于将红旗插上了巍峨的井冈山。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革命实践。

这时的刘少奇正在武汉主持工会工作。当反革命事变发生时，虽然他大声疾呼：对一切反革命事变应一致反对，“立即削平湖南事变！”并领导拥有5000人马、3000条枪的武汉工人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进攻武汉的夏斗寅叛军。但他无力改变陈独秀解散纠察队的决定。

刘少奇抱病将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里。在将一些破旧枪支和童子团的木棍上交后，心情抑郁的他忍痛把出世才4个月的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位工人家里，乘坐贺龙的兵船去九江庐山养病。在林伯渠的弟弟林祖烈的安排下，在庐山牯岭街的一处叫“晓梅别墅”的旧房子暂时住下来。

然而，冤家路窄。刘少奇刚上庐山几天，汪精卫也到了庐山。这时的汪精卫志得意满，自然要遍游庐山。为避开这个对头，刘少奇只得不断地搬家。

10月间，刘少奇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化装成水手悄悄下山，从庐山脚下的星子县登上了一艘客轮，驶向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

28岁的瞿秋白上台后，面对革命的严重损失，心急似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发热。他深信革命形势的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他急于求胜，要求工人暴动、农民暴动。这种不顾实际的盲动做法，导致的结果是：武汉暴动、长沙暴动、广州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都惨遭失败。

面对这一情况，刘少奇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工运潮是低落的。”“目前乡村中革命潮流的高涨，还不是群众有意识的行动。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因此，把它夸大为“直接革命的形势”是错误的。同时，刘少奇认为，悲观失望也是不对的，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来集聚群众的力量，多给群众以训练，使其在失败的时候坚立不拔。

这种认识与毛泽东同期的看法是相近的，毛泽东在远离中共中央的井冈山实践着他的思想，在上海的刘少奇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和指责。

这一问题直到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才解决。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去，他去不了。刘少奇因为“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在此之前，他去了顺直，去解决棘手的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市和后来的河北省。1928年6月6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北京、天津。6月20日，国民党政府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省会设天津，北京市改为北平市。但此时中共组织的名称没有改，还叫顺直省委。中共顺直省委除主要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地区党组织外，还兼管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豫北和陕北等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它是大革命失败后白区保存得较为完整而又较大的地方党组织。

顺直省委自成立以来一直问题不断。1927年5月为筹建中共顺直省委，在中共中央委派的代表和当地代表之间就产生了纠纷。8月初顺直省委成立，彭述之任省委书记。他政治上继续坚持右倾错误，组织上实行家长式统治，加剧了矛盾。9月，为解决纠纷，省委改组，新省委成立后，推行盲动主义，不顾一切地蛮干，革命力量遭受损失，党员减少。许多党员因为遭受挫折

看不到出路,相互抱怨以至攻击,组织更加涣散。中央不得不再次改组省委。但改组后的省委完全否定过去的一切,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把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对个人派别问题的攻击,结果,不但未解决问题,反而使党的组织陷入分裂,保南出现了第二个“省委”。不少党员对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不执行中央决议。

另外,顺直省委的经济问题也相当严重。北方党组织原来的经费来源是依靠共产国际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国际援助减少,地方党组织经费发生问题,大家认为“经济困难,工作无办法”。党员中还存在“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不做事”的现象。

1928年6月,继续北伐的国民党军占领了京津,奉系军阀退到关外,不少党员一时对国民党产生幻想。省委书记王藻文就认为:反对国民党,现在可以不宣传了,我们只宣传工人要东西、立工会;以前工人立工会,没有要东西,那是机会主义,现在我们可以要这样那样,多要一点,不要学以前那样蠢。

1928年3月底,受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来到天津,负责领导和指导北方工会及顺直省委的工作。5月份,根据中央决定参加顺直省委常委。

刘少奇一到天津,心存疑惑的同志便纷纷向他提问,甚至诘难。刘少奇耐心地向大家解惑答疑,对省委负责同志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批评。

6月,中共中央再次采取果断措施,指派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为特派员,组成“中共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主持中共顺直省委、并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于是,一份份署名“谭少连”的指示、通告,频频通过地下交通从天津秘密发出。这是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的代号。整顿顺直省委的工作开始了。

1928年7月,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

9月,陈潭秋、刘少奇先后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起草《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中央告顺直同志书》,随即由中央通过发出;

10月,果断处理了“京东护党请愿团”事件;

11月,编辑出版党的刊物《出路》,统一党内认识。

刘少奇除了指导《出路》的编辑工作外,还亲自为它撰写有针对性的文章,解决党员的思想问题。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

权》、《只有几块钱的事吗?》、《职运须知》、《革命职业家》等文章。这些是他关于白区策略思想的最初一批著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巨准备,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于1928年12月底如期召开。会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来到天津,亲临指导会议。

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传达了中共六大的精神,陈、刘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产生了新的省委,理顺了顺直党的工作方向。

历时长久、让中央头痛的顺直问题总算基本解决。刘少奇也结束了这里的工作,于第二年春返回上海,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

不久,刘少奇又化名赵子祺,去了更北面的满洲。

从1929年7月至1930年3月共8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少奇在白色恐怖的满洲担任省委书记,他确定了满洲党组织总的政治任务和工作策略,加强了党的组织和领导,培训了一批党的干部。他把党的影响“等于零”,工运沉寂的满洲,整顿成为中东路失业工人振臂一呼,各业工人一齐声援的局面。

在这期间,刘少奇又一次蹈险。

7月14日晚,刘少奇偕夫人到奉天。8月22日,因出面了解奉天纱厂党支部组织罢工情况,在纱厂门口被捕。机智的刘少奇抓住敌人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说服被捕的纱厂工人翻供。于是,遭受了20多天牢狱之灾的刘少奇,因“煽动工潮”的证据不足而被取保释放。

刘少奇因反对王明路线,与毛泽东遭遇了同一命运:被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罢官卸职。

1932年4月25日,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文章引人注目的同时批判了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在白区的刘少奇。

文章措辞严厉,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点名批判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刘少奇的又一个化名。

这篇文章是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作者署名“洛甫”。

“洛甫”,就是张闻天,被称为中共中央的一支笔。



1924年6月15日，刘少奇和安源路矿工会工人学校的教职员合影。中间站立者为刘少奇。

当时，他是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二个常委之一，另外两个常委是博古和卢福坦。当时的洛甫和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批判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趣的是，两年多后，这位王明、博古的“坚定战友”，与毛泽东、刘少奇却奇妙地走到了一条道上，和刘少奇一起帮助毛泽东战胜博古。若干年后，再协同毛、刘最后战胜王明，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用张闻天的话说，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是后话。

为什么毛、刘同时被中共临时中央批判呢？

其实，在六届四中全会前，还不是中央委员，毫无革命经验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控制中共中央时，开始是想拉毛泽东和刘少奇进入他的圈子的。王明对曾有过留学苏联经历的刘少奇更加亲近几分。因此，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虽然毛、刘都未出席会议，但都进入了政治局；毛泽东恢复了失掉4年之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推行四中全会路线的中央代表团（称“三人团”）进入苏区，委任毛泽东替代政治局委员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改组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任主席，朱德、项英任副主席。毛成为了苏区中共和红军的最高首长。刘少奇也于1931年秋回国后，即被任

命为中央职工部部长。

但是，王明等人很快发觉，虽然毛泽东、刘少奇反对“立三路线”，这一点和他们相同，但出发点并不一样：王明反对立三路线，是因为李立三不围绕共产国际指挥棒转，反对一切以苏联为中心，而毛、刘反立三路线，是因为它脱离中国实际的盲动性损害了革命力量；而且毛、刘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线和见解，决不是拉一把就能拉过来的人。尤其是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王明急欲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并希望在他离开上海前解决。

王明的策略是：拉不过来就打。因此，他在上海通过红军从公秉藩手中夺来的电台向中央苏区发来一个又一个电报，批评毛泽东。

根据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上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的三大错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代之以被王明路线俘虏了的项英担任。另外，王明指示：由朱德任军委主席，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也就取消了。

遭排斥的毛泽东，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在党内斗争中蒙受了沉重的一击。

刘少奇也遭受了与毛泽东同样的命运。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从满洲回上海的时候，正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恶性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总书记向忠发能力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作为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革命的高潮到了，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面前来。”他调红军进攻大中城市，遭到毛泽东的抵制。刘少奇也不同意这种冒险计划。他劝李立三说：“现在不能罢工，因为条件还不成熟，罢工会失败。”李立三却根本听不进去，反驳说：“你怎么知道罢工一定会失败呢？斗争嘛，要趁热打铁。”刘少奇当然拗不过李立三。

6月，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莫斯